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中晚唐政治史研究

——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李碧妍

已故日本中古史学者谷川道雄曾感慨, 尽管年轻学者在历史细节的研究中已取得超过他们的成绩, 但和他们这辈曾为历史分期论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学者相比, 年轻学者对宏观的历史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而在一个早已习惯以材料与选题为导向的研究时代, 史家能否重新唤起那种久违的、对解决历史问题保有极大乐趣与信心的情感, 能否在对古代世界的研究中寄托历史情怀? 也许, 这也是我们希望更多学术“清流”能出现的原因吧。

中晚唐政治史研究在过去十多年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已成为中古史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焦点之一。这其中, 包括大量中晚唐墓志在内的新出石刻资料的刊布与整理, 无疑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外因。而新世纪以降, 中古学界对“唐宋变革”这一命题的重新关注, 以及学界自身逐渐意识到的亟待改变的重前轻后的唐史研究时段的不平衡, 也很大程度地激发了学者对中晚唐的重新认识和深入考察。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 一些优秀学人与高水平研究的出现, 以其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和高屋建瓴的研究格局, 直接推动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重视。陆扬的研究及其新进出版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一书,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全书分上、下两篇, 除作为附录的《西方唐史研究概观》为学术史评述, 以及下篇中《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一文为针对魏晋南北朝墓志整理成果的专业书评外, 主体由七篇唐史研究论文构成。其中大部分之前曾作为单篇论文刊载过, 此次为集结成书, 做了一定的修改扩充。另有部分文章则是作者在此前研究基础上的重新撰写。这些文章从最初发表到此次集结成书, 几近十五年, 而作者对中晚唐历史的思考, 时间跨度则更长。指出这一点, 并非说明此书是十余年来作者所撰写唐史论文的汇集杂糅; 也不仅仅表示这是作者在某个特定主题下对其以往研究进行条理整合的系统化展示; 从笔者的角度来说, 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连续而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个展现作者思考脉络的绝佳文本。因此这篇书评的目的, 就是以期望对这种思考脉络的复述与评价, 来重现作者心目中的中晚唐世界, 同时探讨这一思考对中晚唐研究的价值及对我们

的启发。

从研究范畴来说,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以下简称《清流》) 一书可以被归类于政治文化史的范畴(序论 10 页)。谈到“政治文化”一词, 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作为作者导师的余先生在其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对“政治文化”所作的释义。余先生在其书的《绪说》中解释到, “政治文化”相当于英文的“political culture”, 大致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 绪说 5 页)。而其第二层涵义, 则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绪说 6 页)。

和余著的研究路径相似, 《清流》一书同样采取了政治史和文化史交互为用的研究方法, 即以政治史的视角处理权力结构及其实际运作, 而以文化史的视角把握时代的种种观念和理想, 但并不对后者作孤立的处理, 而是把它们和实际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作观察(绪说 6-7 页)。《清流》一书所涉及的两大主题——制度化内廷的出现与特殊的“文”, 大致也是围绕这两个视角展开, 并且互有关联的。

特殊的“文”是《清流》一书中最重要主题。“文”是我们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和群体时经常运用的一个概念, 具体到唐代的研究中, 一种是将“文”的概念限定在“文学”的范畴中加以讨论, 比如涉及文学体裁的古文与骈文, 关于文学思想的古文运动、经学复兴等。另一种则是将“文”作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化, 这在历史领域中运用得更多, 有时也将其与“武”作为对举的概念。但在使用后一种“文”进行政治文化的研究时, 我们对“文”的内涵则很少做分析。因而看似可以利用“文”来解释中古社会发展的很多历史现象, 但其实并不具有真正的解释力。

《清流》一书中所指的“文”

有具体的所指, 它是一种特定的文学观, 并由这种文学观指导了一种特定的文学实践。这种文学观有别于我们今天对中古文学作品的评价, 而是认为, 评鉴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准或文学的价值, 必须要与“治术”结合在一起(290 页)。用作者的话说, 就是好的文字必须具有“体国经野”的政治功能, 而优秀的文字工作者就是要运用“文”的手段、或发挥他“文”的才华, 对实际的政治运作发挥作用并产生影响。而实现这种最高的政治目标的文字就是在充分了知政治形势下, 通过文字恰如其分地实现政治的沟通, 维系政治的平衡或瓦解政治危机。

有关这种文学观产生的过程, 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讨论, 但据作者的分析来看, 皇权的出现应是推动这一文学观产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一文学观大约在武后、玄宗时代初露端倪, 是武后创建新文治模式的重要手段, 从这时起, 文字的政治功用开始显现出来、并且已经为政治精英所清楚认识了。

那么, 这种文字是以何种文学体裁表现出来, 书写这种文字的又是哪些人呢? 作者指出, 这种文学体裁就是以“诏书”为代表的各类表状笺启类应用文, 它是中晚唐文学精英最在意、也是其眼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类文字。而撰写这类文字的代表人物就是拥有草诏权的“词臣”。《清流》一书中有三篇文章——《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以下简称《上官婉儿》)、《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下简称《词臣》) 及《冯道的生涯》就是专门研究唐五代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词臣的。

《词臣》一文是通过六方不同时期的词臣墓志, 勾勒词臣这一群体从武后时代到五代初期的发展脉络。其中可看出词臣地位的逐渐上升, 其在内外廷体系中职务转迁的逐步制度

化, 以及其对自身身份认同感的日益增加。此文同时也是一篇对此时代词臣墓志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作者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词臣墓志的两个特点: 撰写详细, 书写质量较高。因为这类墓志大都由同时代的著名文臣撰写, 撰写者对志主多半有很强理解, 在写作时往往也会将自身的角色认同代入到写作对象中(284 页)。接着, 通过六则不同时期的案例, 作者展现了词臣墓志在书写过程中的一些变化, 比如对词臣意义作出清晰定位的文字何时出现、其是如何成为评价词臣的固定模式的(289 页)。再进一步, 作者也分析了词臣墓志撰写者的写作心态与他们试图传达给心目中读者的究竟是何种意旨(299 页)。而通过这类书写, 一种怎样的舆论正在形成(288 页), 它是如何引起人们政治心态变化、并潜移默化地改变政治文化的。现代读者在阅读这类文字时, 是否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有没有忽视其中的微妙意旨或造成误解, 等等。

可见, 作者不仅创造性地首次指出, 文字书写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其所具有的影响唐王朝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 还通过他对史料书写意义的重新阐发与实践研究, 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书写对唐史研究的重要影响。

至于选择上官婉儿和冯道这两位引起古今中外史家反复争论、定评不一的历史人物来进行重新研究, 则并不是作者想在原有的阐释框架下再去为两者的身份或名声进行辩护, 而是要重新树立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是以唐五代当时人的政治文化理念、而不是后来者的理念为依据的。作者指出, 只有将上官婉儿与冯道置于上述所说的这一特殊的“文”与政治的关系中, 对两者的评价才是有价值的。因为婉儿和冯道正是他们那个时代上述这种“文学观”最典型的

实践者, 以及唐五代政治文学精英眼中的楷模, 这才是作者重新关注上官婉儿与冯道的意义所在。

当“文”与政治相结合, 政治功用成为文学精英对“文”的核心认知, “文”也成为政治才能的一种主要的衡量标准; 以“文”为途径来推行的新政治模式, 也通过制度与用人措施(比如“科举”与“内廷制度”) 弘扬这种理念时, 一个新的精英群体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也诞生了, 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清流”与“清流文化”。

《唐代的清流文化》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较为清晰地解释了“清流”的定义、主要特点和意义。在作者使用这个概念前, 我们对在唐史研究中使用“清流”一词还是极为陌生的。其实正如作者在序论中所说, 他也是近年来才开始采用“清流”和“清流文化”这些概念, 并且, 迄今也很难在英文表述中找到恰切的名词、所以只能用自创的专有名词来进行指涉(序论 10 页)。作者的这一为难恰恰说明, 在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以及追寻历史内在脉络这一点上, 作者有相当的敏感和自觉。“清流”在唐代文献中出现过, 因此它比其他概念更能反映唐人的真实认识。但即使如此, 这个出现频度并不高、且对现代研究者而言并不具有不言自明含义的概念, 也需要首先对它的内涵、特点进行充分的说明, 才能用它来概括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也因此, 它无法在另一种文化的体系下找到恰切的语汇来进行表达。所以“清流”一词对读者而言虽然较为陌生, 但并不是作者哗众取宠的选用, 而是精心考虑后的结果。

作者指出, 清流并非一种制度上的身份, 而是依托社会想象和政治成功所形成的一